

反戈一擊： 記亞際文化研究社群暨亞際文化研究讀本出版

Turn Back to Hit:

On the Publication of the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Reader in
Chinese and Its Research Community.

羅小茗¹

Xiaoming LUO

在進化的鍊子上，一切都是中間物。……他的任務，是在有些警覺之後，喊出一種新聲；又因為從舊壘中來，情形看得較為分明，反戈一擊，易制強敵的死命。但仍應該和光陰偕逝，逐漸消亡，至多不過是橋梁中的一木一石，並非什麼前途的目標，範本。跟著起來便該不同了，倘非天縱之聖，積習當然也不能頓然蕩除，但總得便有新氣象。

魯迅〈墳·寫在《墳》後面〉

一、活生生的「亞際」

最初聽聞「亞際」(Inter-Asia)，是在華東師範大學文科大樓的一間小會議室裡。那個時候，21世紀剛剛開始，「911」還沒有發生，大學還不知道自己會搬遷到郊區，中文系的學生們，仍徜徉在魯迅振臂一呼過的禮堂和《子夜》描述過的麗娃河之間，固守著自己的「鄙視鏈」：計量與考

1 投稿日期：2018年5月9日。接受刊登日期：2018年5月25日。

羅小茗，上海大學文化研究系副研究員。

電子信箱：manmandu@163.com。

核的制度，還沒有來得及在大學裡招募大批的信徒，大學和每一個人人都必須國際化的意識，也沒有那麼熾烈。就在這種散漫、自由也因此不知道應該做點什麼才好的氣氛中，一位叫做陳光興的臺灣教授，突然出現在那間小小的、堆滿書櫃，因此顯得雜亂而擁擠的會議室裡。那是一個略顯陰沈的下午。因為不是教室，也就沒有什麼黑板，唯一有的是一塊臨時搞來的小白板。這位教授，以他特有的手舞足蹈，畫出勉強能看明白的臺北、首爾、上海、北京、香港、東京、加爾各答……然後告訴我們說，這些地方應該串聯起來，成為「亞際」。地圖成型的那一刻，外面已是黃昏時分，卻突然有了太陽。於是，一抹淡淡的陽光打在「地圖」上。想來那一天，他一定講了更多的什麼是「亞際」，為什麼要「以亞洲為方法」之類的事吧。然而，對我來說，記憶裡最鮮明的，不是那些道理，而是這樣的一個場景：陽光打在一張奇怪的「地圖」上，「地圖」旁站著一位精力旺盛、躊躇滿志的「怪叔叔」。

這便是我和「亞際」最初的遭遇。或許這樣一個具體而形象的開始預示著，此後十多年，在中國大陸文化研究以及對此感到興味的年輕人的生長過程中，「亞際」將以這一特別的方式在場。因為自那之後，陸續便有來自新竹、香港、沖繩、首爾、東京和加爾各答的朋友，講他們的思考和那個他們眼中正在起變化的世界；有專為年輕學生舉辦的各類暑期班和聯合課程，拉著大家在亞洲的地界上跑東跑西，「在地」一把；又有定期的刊物、會議和工作坊，把人攏到一起，碰撞、「吵架」，喝酒、「和解」。以此面目出現的「亞際」，既非繞口的字句、抽象的概念，也非課堂裡的正襟危坐、暗暗較勁，而是充滿了情感的個體、場景、事件、論爭，以及由此而來的相互「看見」與彼此「惦記」。

於是，對我來說，「亞際」是白元淡老師寬厚的肩膀，哭泣時最好的依靠；是梅根（墨美姬）永遠的興致勃勃，是Grace的高效幹練、以一當十；是Ashish令人眩暈的印度英語，是慢悠悠的陳清僑茂密的大鬍子，也是專心致志的池上胡亂扣起的衣扣。「亞際」是2007年的聖勳說「小茗，明天的發言，我好緊張」，是2015年的聖勳，在商量「熱風學術」的工作

會議前，自告奮勇彈唱的那一首歌。「亞際」是新竹的小酒攤，是花枝丸和空酒瓶，是光興老師對老闆大聲說：「她，上海來的」，老闆則回答：「我的女兒在上海工作噢！」「亞際」是一群馬來人、香港人、臺灣人和大陸人開會，現場忽然用粵語熱烈爭論起來，聽不懂粵語的我，感到的滿滿的錯愕與驚訝。「亞際」是最初亞洲其他城市讓人咋舌的物價，大陸學生的囊中羞澀，也是越來越多的朋友，開始抱怨上海的物價，覺得「來不起上海」。「亞際」是亞洲各地的文化研究者跑來向中國大陸的同行「討債」，提出我們無法回答的問題，「嫌棄」我們對於歷史和現實的檢討工作，大大落後；也是我們對於那些「想當然」的批評予以反擊，在焦慮和反思的夾擊中，還之以一個我們理解的「中國」。

幾乎同一時段，中國大學開始了「爭創一流」的國際化徵程。回顧起來，彼時懵懵懂懂，只想「更好玩一點」的我們，正是被這些裡裡外外的力量推動著，忙碌起來，卻並不十分清楚，自己正在加入和經歷的，實際上是活生生的「亞際」與由官方校准的「國際化」之間那一場漫長的較量。

二、「看見」之後

過分美化這個磕磕絆絆地「相互看見」，終於「彼此惦記」的過程，並沒有太大的意義。畢竟，亞洲各地的經濟、歷史、文化政治狀況與連帶關係，與人心一樣，凹凸不平，起起伏伏。至今記得，2006年的冬天，博士論文寫到一半，正是艱難的時候，卻被王曉明老師派去首爾開會。那時，恰逢第二年亞際文化研究年會在上海大學召開，「亞際」的老師們別出心裁，在大會之前設置了為期一天的「青年場」(pre-conference)，讓我們自己玩。具體的做法，是研究生們組成委員會，共同決定「青年場」稿件的取捨，組織這一日的學術活動。於是，為了實現這個目標，天南地北，新竹的Emma（純瑀）、香港的小島、東京的小泉、上海的小茗，以及本應是東道主，卻因在日本掉了護照只能臨時找朋友代為出席的韓國同學，大家擠在光州的一間小旅館裡，像模像樣地「工作」起來。在決定一組中國

大陸的投稿時，有人提出拒收，理由是這樣的城市空間議題已經過時了。而我只能用蹩腳的英語據理力爭，強調城市化和空間生產的問題，對中國大陸來說正當其時。就這樣，彼此爭執了好一會兒，方才決定錄取。那個panel的內容，沒多久便忘記了。念念不忘的，是這個爭執的場景和當時心裡複雜的感受。

彼時的世界圖景，還不是2008年之後的模樣。對中國大陸而言，無論是日本，還是亞洲四小龍，仍是有待接軌的一部分。中國大陸的文化研究，也剛剛開始。儘管「亞際」的野心，是要通過亞洲各地區之間彼此「看見」，以及由此而來的相互參照和自我理解，打破「先進」與「落後」的桎梏，打掉由歐美學界遙控壟斷的判斷標準，但要實現這一點，卻遠沒有那麼容易。這是因為，理念與行動之間的轉換，仍有待時日，參與者自身要破除慣性，理解對方的「想當然」，更有很長一段路有待摸索。更多的時候，即便是自認為揣滿了友愛和善意，彼此真正「看見」的瞬間，卻也可能是忽然降臨的疏離、輕慢、自滿、大驚小怪，乃至過分自尊。

對我來說，光州小旅館裡的爭論，正是這樣一個忽然「看見」的瞬間。自晚清以來，中國人勉力趨新，在骨子裡認為「新的總是更好的」，且以這樣的心思去打量世界，判斷高下，既有害怕落後於世界潮流的卑微，又由此生出對更「落後」者的輕視與冷淡。文化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也不例外。也許，只有在「亞際」的框架內，這樣彼此「看見」過，才會意識到，去正視這一類新／舊的說辭以及潛藏其後的卑微與輕視，替之以相對中正的態度——既非理所當然，也非刻意反其道而行之，對大家來說，都是這麼地不容易。並且，這樣的遭遇，也不會立即誕生一種所謂的「正確」態度。更多的，倒是一份情感上的警惕。比如，等到之後看到越南來的投稿，發現自己的第一反應居然也是「這樣的研究有點過時吧」，此時生出的，就是對自己的不滿意和對這個反應的大大的懷疑了。

在我的理解中，這就是「亞際」創造的彼此看見與相互參照。它從不擔保友誼與美好，離很多人擔心／憧憬的「大同」，更是遙遠得很。許多時候，「亞際」是在這個紛亂下墜的世界中，把青年人之間展開思想交

流的現實基礎努力夯實，以便每一代的後來者，在除卻幻象之後，果斷地去承擔自己的那一部分歷史責任。這一夯實的過程，既不「高大上」，也無從保證結局的圓滿。然而，通過彼此看見而意識到的自身位置與身心結構，對此展開反思和釐清，卻是「亞際」夯實與站穩的第一步。如果說，一開始，身處其中的年輕人難免將信將疑，在這些不夠圓滿的過程中徜徉或抱怨的話，那麼，慢慢地，便會發現，越來越多的身體感覺、個人情感和思考意識，已不知不覺捲入其中，被這一過程重新編碼。

比如，就在前幾天，一位認識了很久的臺灣朋友告訴我，2007年她們因亞際的「青年場」來大陸時，最大的感受是，「原來大陸人長這個樣子。」在今天聽來，這個遭遇的起點，還真是有點“low”，一點都不學術。這或許是因為，那個時候世界還不是平的，彼此間仍有縫隙，讓人繼續懷揣對他人的奇異想像。然而，也就是這幾位前一年還在訝異「大陸人面目」的臺灣同學，在上海參加過暑期班後，隔年便在臺北「自食其力」，把大家組織去一個廢棄的遊樂園參加夏令營，邀請年輕的研究者和研究生們參加。他們自己寫提案，自己找錢，自己安排議程，也自己跑「外事」。也是在這個過程中，大家開始發現，要讓「彼此看見」得以發生，原來要經過那麼多科層化的手續與人事，這背後是滿滿的曲折的「政治」。即便是拿到了所有的公文，也還會出現意想不到的狀況。本來，受邀前去的大陸同學不少。可在申請手續的道道關卡和「什麼樣的學習更有價值」的自我審查之下，如約前去的人越來越少。等到最後，只剩下了三位。更沒想到的是，最先要入臺的那位同學，在香港機場轉機時被告知，必須等到通關文件上所有人員到齊，方能過關。於是，他只能在機場板凳上過了一夜，靜候其餘兩位的到來。當時，這位同學，年紀輕輕，卻意外地留著一大把絡腮鬍子。等我第二天在候機大廳找到他的時候，第一眼的反應是，「這些鬍子不會是一夜之間愁出來的吧？」

多年之後，我們會時不時地懷念這場遊樂園裡的夏令營，感嘆當時彼此之間的「無知」、「相敬如賓」和「大驚小怪」。也是因為這樣的經歷，我們很難再把「亞際」視為安排好的理所當然。顯然，在與官方校准

過的「國際化」的這場較量之中，除了老師們的鼓勵、年輕人對「別樣之地」、「他鄉之人」的好奇與熱情之外，「亞際」沒有其他保駕護航的法器。政策、行政、官僚、人事、財務，總是有各種理由跳出來搞亂添堵，而我們自身的自以為是、理論崇拜、知識（特別是書本知識以外的其他類型的知識）匱乏、「優等生」心理，以及抗壓能力不足，也常常會對它發起突襲。然而，這些不足，又恰恰是亞際繼續充滿活力的緣由。在磕磕絆絆、遠不那麼美好的遭遇中，給了青年人無處不在的機緣，去鍛鍊一種更加穩定和健康的精神狀態。

三、「舊壘」與「新氣象」

在某種意義上說，陸續出版中的「亞際文化研究讀本」，既是這個活生生的「亞際」的一部分，也是為這一類「遭遇」更鮮活持續地發生而準備的知識上的條件。

自2008年以來，兩年一屆的暑期班(summer school)，由參加亞際機構聯合體的大學輪流主辦，已經進行了六期。在此過程中，發現的一大問題是，亞洲各地的學生，往往「自帶」西方學界的理論資源、話語方式和對本地經驗的興趣。在此之外，對其他社會中既有的思想文化脈絡，以及正在發生的研究狀況，則普遍缺少瞭解和學習的路徑。這一狀況，顯然受制於當前全球範圍內的知識圖景和可能的交流語言。不同語言和版本的亞際文化研究讀本，則是針對這一狀況，為建立一個亞洲不同社會之間可以分享與「對視」的知識譜系，做最初步的工作。

2015年，受亞際文化研究機構聯合體的委託，由特賈斯維莉·尼南賈娜(Tejaswini Niranjana)教授和王曉明教授主編的*Genealogies of the Asian Present: Situating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作為亞際文化研究讀本的英文版出版了。《反戈一擊：亞際文化研究讀本》同樣是這一委託的產物。不過，中文版的讀本，並非這個英文版的照搬翻譯，而是根據中國大陸文化研究的需要，重新挑選和組織的結果。在這裡，也就有必要說明一下，什

麼是編者判斷的中國大陸文化研究的需要。

首先，對中國大陸的思想界和新興的文化研究領域而言，「亞洲」，乃至在此基礎上推進一步的「亞際」，並非一個深入人心的概念。整體而言，在世界格局正迅速發生變化的時間節點上，比照框架的改變、知識譜系的調整乃至「國際視野」的重新調校，正變得越來越舉足輕重。近年來，隨著孫歌、陳光興等老師的推介，竹內好(1910-1977)、溝口雄三(1932-2010)、新崎盛暉(1936-2018)、陳映真(1937-2016)、白樂晴、查特基(Partha Chatterjee)等思想者，正被越來越多的人瞭解和閱讀。然而，隨著中國崛起，這些改變的發生，是將更加自覺從容，還是越發局促困難，這一點卻遠不是那麼清晰的。如何思考何謂「亞洲」，不僅急需瞭解在被動現代化的過程中，早期思想者對於文明和國家的態度，也需洞悉進入21世紀以來，亞洲各地正在遭遇的變化。不僅需要從受侮辱和受損害的角度去理解「國際」，也需要從那些似乎富強起來或富強過了了的國家與地區的現狀，去把握中國當前的位置。或許只有如此，方能回答在中國最貧弱的時候，孫中山提出的問題——「中國對於世界究竟要負什麼責任？」因此，在中文版的「亞際讀本」中，第一輯和第二輯的內容，便明確圍繞這一需求展開。

其二，在此過程中，什麼是文化的作用？或者說，在社會文化的巨變過程中，文化是如何積極/消極地參與和推動這一重構的？對於文化研究來說，這無疑是最核心的問題，卻很難說在中國大陸得到了持續的關注。這或許與文化研究在1990年代中期被引進、推介和就此展開批判的現實脈絡相關。從早期的符號學操作，到對政治經濟學的強調，再到對於社會學人類學方法的青睞/「嫌棄」，作為一個不斷檢討，因而極有動力趨新的研究領域而言，文化研究總是希望找到更合適的理論工具和思想方法，去思考和介入當代思想文化的生產。然而，這一心急火燎的過程，也往往使得「文化」如何在社會巨變中發揮作用，這一問題失去准心。更多的時候，「文化」看起來像是在思考開始之前就已經被設定完畢的武器，以便研究者拿來躍入現實的陣仗，揮舞一番。於是，在這場看起來很熱鬧，而

且恐怕會越來越熱鬧的戰事之中，作為武器的「文化」，到底如何在這個社會裡生成和成立？為什麼偏偏是武器而不是桎梏？它被審視、珍惜或摒棄的緣由是什麼？它究竟如何在這個過程中篡改或創造？對於這些問題的思考 and 追問，常常闕如。第三輯「文化的力量」，便提供了「亞際」範圍內，這一部分的相關思考。而其他各輯中，也不乏可以從這一角度獲得借鑒的文章。比如，南迪(Ashis Nandy)的〈確信的曙光〉、莎拉·雷蒙的〈在全球經濟的子宮裡〉、阿西什·拉加德夏沙(Ashish Rajadhyaksha)的〈何時寶萊塢？文本分歧與歷史分歧〉等。

其三，如何擺脫過於厚此薄彼的「文本」選擇？對中國大陸文化研究而言，從中國現當代文學和文藝學開始的這一研究思路，存在著一個先天的不平衡。那就是，過於重視狹義的符號化的文本——文學、影視作品、廣告等等，而對於實際的城市空間、社會事件、市場機制、認同模式等廣義的社會文本，既缺乏興趣，也缺乏觀察、分析和把握的能力。這種先天的不平衡，既導致由對符號學的批評而來的「政治經濟學」調整，常常變成了相對簡單粗暴的階級劃分，文化在這一劃分中被取消了位置；也使得原本應該是看家本領的符號分析，失去了廣義的社會文本的支持，難以維繫其應有的政治維度，退化成了學院式的技術操演。當前，隨著越來越多不同學科背景的青年學人的加入，這一狀況得到了明顯的改善。然而，如何更好地協調不同的文本類型，使之相互支撐，形成更為整體性和有生產性的思考，這一問題仍然十分緊迫。針對這一狀況，讀本既選擇了將城市作為一種媒介／文本展開討論的一組文章，也提供了對諸如「世界盃的女性化」（金賢美：〈2002世界盃足球賽的「女性化」和女性「粉絲」〉）、日本臨工運動（卡爾·卡塞格：〈讓我們活！日本臨工運動的培力和生活修辭〉）等等廣義的社會文本展開考察與研究的範例。

其四，與第三類問題相伴隨的一個表現，是中國大陸文化研究對於制度、政策的忽視。儘管在研究「過去」時，把制度、政策、法律法規等文件納入視野，已經蔚然成風，但在研究「現在」時，這樣的習慣，還遠沒有形成。其中的緣由，大概是兩個。一個是，中國社會的現實，雖無

一不是受制於這些官方文件，被其指導或規整，但「名實不副」的廣泛存在，往往讓生活於其中的研究者，對之產生輕慢之心。另一個是，事關制度政策的文獻，大多枯燥，越是當代，越是官氣十足，閱讀和視聽起來，自然沒有小說、電影那樣令人愉悅，容易產生興味。而在這之後，實際上是所謂的「興味」和文化研究所欲正視和勾勒的「現實」之間，究竟應該是何種關係的問題。至此，當我們鼓勵學生，要按照自己在日常生活中的興趣，去發現和思考現實的時候，一個繞不開的問題恐怕是，當依據興味的探索，終於挖到了制度和政策的高牆之下的時候，下一步的突圍，應該如何進行？對此，中國大陸版的「亞際讀本」選擇了一些側重於制度、機構和法律條文的研究，以供參考。比如，項飈對跨國家之間勞動力流動機制的討論（〈勞工移植：東亞的跨國勞動力流動和「點對點」式的全球化〉）、何春蕤對臺灣的立法和媒體何以生成嬌貴化主體的回顧與批判（〈情感嬌貴化：變化中的臺灣性佈局〉），以及王曉明對文化研究在中國大陸高校體制內遭遇的建制問題的思考（〈文化研究的三道難題〉）等。

其五，如何展開對於文化的流動性的研究？自1990年代以來，亞洲各個國家和地區之間的文化流動，無疑是一個令人矚目的現象。無論是早先的「哈日」「哈韓」，和如今印度電影在中國院線的傲人戰績，還是中國遊戲業對亞洲其他地區的滲透，不同社會之間的文化流動以及由此形成的資本與文化之間相互牽制、彼此支援的關係，已經越來越使得當代的文化，特別是流行文化的生產和消費，不再是一國之內的事業，而勢必隸屬於不同國家與地區之間基於既有的體制磨合而成的一套文化生產、流通和消費的龐大的國際機制。一方面，正是這一機制，使得「喪」和「小確幸」這樣的命名，通暢地流動在亞洲文化圈內，引發新一輪的商機；另一方面，這些命名也經由這一機制，在流通過程中被持續地填充、改寫和進一步傳遞擴散，引導不同社會狀況裡的年輕人對於自己的狀況，做出判斷和思考，遙相呼應。至此，如何把握在此過程中，文化的流動性賦予年輕人的力量、視野和新的可能？對於這一點，「亞際」的「彼此看見」提供了什麼樣的新的解釋框架？顯然，這一部分的工作剛剛開始。目前看來，也是文化研究所能提供的整體性理解中，最落後於現實的部分。

就此而言，〈K-pop的亞洲化：在泰國青年中的生產、消費與認同模式〉（Ubonrat Siriyuvasak、申炫准）、〈印度二線影院中的香港動作電影〉（S.V. 斯瑞尼瓦斯）等文章，做了別具意義的嘗試。

最後，是中國大陸文化研究對於表達形式的「不假思索」。在越來越多的青年學人的手中，一板一眼、註釋規範的學術論文，似乎正在成為文化研究最自然的表達形式。然而，不得不指出，這一變化，既是學術體制變革的一個結果，也是文化研究需要定睛思考的越來越鐵板一塊的現實的組成部分。對於這一變化的利弊是非，此處無法展開詳細的討論。而讀本中的幾篇選文，比如，〈學作工：研究所的論文指導與學術工作〉（蔡如音）、〈教育就是社會運動（訪談）〉（許寶強）等，則提示了，文化研究理應對表達形式做更為深入的思考和探索。希望這一類模樣特別的選文的存在，可以為今後更多的文化研究式的表達，埋下一點伏筆。

眼前的這一中國大陸版本的「亞際文化研究讀本」，便是根據以上六類需要，選編而成。整個讀本分九大專輯，每一輯旨在提出一個值得文化研究特別關注的核心議題。這些專輯，有些和上述「需要」彼此重疊，有些則同時肩負回應幾種不同「需要」的職責。

細心的讀者會發現，在此讀本中，性別研究並未成就一個專門的議題，而是被分散到了不同的問題之下。這並不意味著，性別議題不重要，而是說明，按照專輯來讀，實際上只是對讀本的一種使用方法。我們更希望看到的，是使用者在此之外，通過自己的問題——既可以是對文化研究的理解，也可以是對自身學習的設定，將讀本內的選文，重新排列組合，使它們在被閱讀和學習的過程中，不斷呈現出新的結盟方式。

四、歷史的「一頁」

如今，那些經由「亞際」而認識的朋友們，彼此聊天時，一個經常出現的話題便是，對於成長於斯的「亞際」，我們這一輩人究竟可以做些什

麼？在此背後，一個更大的問題是：儘管各地的狀況不盡相同，但總體而言，經由上一輩人的努力，文化研究在亞洲經歷了將近20年的引介、推動與建制的興盛。在此之後，特別是當社會形勢普遍右轉、各種體制內外的可能性一再緊縮之時，各地的文化研究可能選擇什麼樣的道路，如何彼此合作與遙相呼應？

2018年8月，由ACS和上海大學合作舉辦的第12屆世界文化研究雙年會 Crossroads 將在上海召開。一個令人欣喜的現象是，從大會收取稿件和招募志願者的狀況來看，文化研究在中國大陸的傳播和擴散程度，大大超出了主辦者的預期，越來越多不同學科背景的研究者和青年學生正匯聚於此。然而，與此同時，同樣可以鮮明感覺到的，是近十年來，在國家大力推動文化產業和熱衷於智庫建設的大潮之下，研究「文化」正在成爲一樁熱門生意。如果說，文化研究在大陸初興之時，彼時的政府正疏於對文化議題的興趣和理解，一門心思搞經濟的話，那麼現在，政府越過資本，直接干預和爭奪對於文化的定義，已成定勢。

於是，一方面，跨學科的研究被積極倡導，以「問題」爲導向的研究，日益吃香，但另一方面，卻是理論和研究思路越發趨同，學術科層化越來越嚴重。在這樣一個學術環境再次急速變動的時代裡，保持一種批判的思想特質，賦予其有效的傳遞和擴散形式，正變得越來越艱難。在這一新形勢下，「亞際」的聯合，對於中國大陸文化研究的意義，便不僅指向一種另類的「國際化」，意在鍛造不同尋常的國際視野，同時也指向一種依靠不同社會間的對視和聯動，持續製造一種無從馴服的氣質的。在這一意義上說，如何保持「亞際」既有的知識生產和組織方式，乃至創造出更新的積極形式，也就成爲後一代人的任務。

大概兩三年前，儘管大多數選文還未確定，我卻早早定下了亞際文化研究讀本的書名——「反戈一擊」。正如魯迅先生所說的那樣，在進化的鏈條上，所有人都不過是中間物。而文化研究者，大概算得上是這個變動的時代製造出來的半新半舊、無所適從的中間物中一類特殊的物種。然而，真正的致命一擊，卻也只能在這半新半舊之中醞釀和發生。就此而

言，在讀本內外、「亞際」周遭，所發生的一切閱讀、思考、研究乃至組織工作，既是半新半舊者們書寫的歷史，也是為反戈一擊做著綿延的身體、情感、思想和心力上的準備。

顯然，較量遠沒有完結。「亞際」的這一頁，還有待我們定神書寫。